

遠方的印象—— 宣德官窯青花瓷燈的伊斯蘭元素

■ 余佩瑾

這一次，因為參加「航向天方——十五世紀的伊斯蘭印象」策展工作，而有機會重新檢視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十五世紀前半葉的官窯瓷器，並且嘗試透過美國學者 John Alexander Pope（1906-1982）經典著作提示的角度，思考其中一部分作品反映出伊斯蘭風格樣式的問題。依照進度，以下以宣德官窯青花花卉紋燈為對象，探討作品背後蘊含的交流意象。



圖1-1 明 宣德 青花花卉紋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05957



圖1-2 明 宣德 青花花卉紋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5945



圖1-3 明 宣德 青花花卉紋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5946



圖1-4 明 宣德 青花花卉紋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04090



圖2 明 宣德 青花花卉紋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05957

瓷燈傳世的軌跡

本院收藏四件宣德青花瓷燈（圖1），四件作品於器身均清楚地標記出「大明宣德年製」款（圖2），通過年款，我們得以見識到明朝宣德官窯（1426-1435）青花瓷的質地與特色。以器形而言，四件中的三件具有相同的造型；另一件則不具高足、承盤和把手。（見圖1-4）三件相似器作中，一件帶蓋，另兩件成對收貯於清朝乾隆時期（1736-1795）配製的糊錦木匣。

（圖3）再就細節特徵來看，三件作品的上半身均形塑成一個扁圓壺式的容器，壺身上置圓口，下設高足。同時，扁圓腹部的前端設寬口短流，

後端則加附曲形細把。把手上端與器身相連，銜接處並且加置一個圓形小繫孔，下端則黏附於承盤的沿邊。整件作品藉由高足和曲把的設計，讓器身安穩地置於承盤之內。仔細觀察的話，儘管目前帶蓋作品的器蓋，因釉色明顯與器身不同，而反映出係為後配的可能性。但從繫孔具有穿繩綁住器蓋的功能，可以推想目前不見蓋子的另外兩件瓷燈，最初或應配製有器蓋。

其次，就裝飾紋樣來看，流口下方沿著壺身，以及高足底部均環繞一圈折枝花葉紋，而器口內側和壺身下端與高足銜接處，又以斑點



圖3 明 宣德 青花花卉紋燈與原狀包裝木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5945 / 015946

排佈成一圈裝飾圖案。承盤沿邊並且極其工整地畫出方格，再逐一填入小圓點。盤外有一圈卷草紋（又稱卷雲紋）。紋飾分層排佈，各層次之間，另外加飾青線數道。

至於，那件器形稍微不同的瓷燈，一旦對比另外三件作品，可從相同的扁圓壺身和裝飾紋樣，想見其原型必然與之相同。尤其，目前所見缺把的壺身，不僅仍然具有圓形小繫孔，孔側端點，以及器身底部，現在看起來像是矮圈足的底緣，都經過仔細打磨處理，呈現出光滑、平整、不刮手的質地。（圖4）因此推測這件缺足，短少把手和承盤的瓷燈，或是傳世殘器。亦即，在無法追溯的某個年代中，使用者因不慎而造成瓷燈傷損，在惜物不捨丟棄的心態下，於是整裝成現在的模樣。

另一方面，通過文物典藏號碼的提示，我們也可以回溯出1925年以前，四件瓷燈的貯存宮

殿。以其中成組收納的兩件瓷燈為例，根據清室善後委員會盤點清宮遺物，登錄於《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的狀況說明，得知這兩件作品原來存放在紫禁城的乾清宮，當時登錄的品名是「宣窯青花燈一對」。它們的原狀包裝，就像今天看到的情形一樣，隨附「錦二，匣一」。¹按照這層線索，又可以在乾隆六年（1741）的《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發現相關的紀錄。根據「乾清宮」記事，十月初一日那天，太監高玉等人從庫房取出「青花白地小燈一對」，然後依照皇帝的旨令，把兩件瓷燈送去配製木匣。這項工作，依照同一則記事補登的事項，一直到了「乾隆七年八月十一日」，管事人員才將兩件瓷燈送回。（乾隆六年十月初一日〈乾清宮〉）

同一年，時間稍晚一些的「廣木作」記事，也出現一則看似相關的紀錄。十一月十四日，



圖4 明 宣德 青花花卉紋燈 底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040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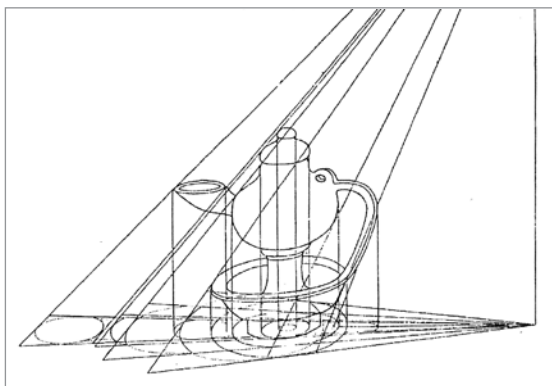


圖5 視學插圖 取自(清)年希堯,《視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雍正刻本影印,冊1607,卷3,頁99。

太監高玉等人提出「宣窯青花小壺二件」,想為它們配製木座。而這兩件作品也附帶「錦匣一件,錦袱兩件」。由於包裝樣式和傳世所見兩件瓷燈相同,且瓷燈也具有扁圓壺式的造型,故引起筆者注意。根據紀錄,兩件小壺的紫檀木座,在十一月十九日製作完成,隨後管事人員也就連同物件,將之送回保管處所。(乾隆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廣木作〉)如果這則記事敘述的物件是瓷燈一類器物,那麼,檔案訊息輾轉告訴我們,瓷燈最初還應隨附木座。這個狀況,一如乾隆八年(1743)「廣木作」的紀錄,一批交付配製木座的物件中,也包含一件「宣窯青花書燈」。(乾隆八年四月八日〈廣木作〉)

不僅如此,瓷燈流傳於清宮的狀況,同時可透過雍正年間出版的《視學》來理解。雍正朝(1723-1735)的督陶官年希堯(1671-1738)曾將義大利畫家 Andrea Pozzo (1642-1709)的《繪畫與建築的透視學》(*Perspectiva Pictorum et Architectorum*)翻譯成中文,並於雍正七年(1729)刊行首版圖書。譯著過程,如同序文所言,年希堯數度向 Andrea Pozzo 的學生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請教,該書於雍正十三年(1735)修訂再版時,也將部



圖6 清 雍正 青花勾蓮紋書燈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北京故宮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編,《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御窯瓷器·卷一·下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頁113。

分官窯瓷器納入,作為解說視線落點的插圖。(圖5)

若將其中一件瓷燈,同時對比明朝宣德和清朝雍正兩個官窯生產的青花瓷燈(圖6),首先,就前後相差三百年左右的物件本身來看,我們可以從雍正朝仿作品的器身較為豎圓、高足更為挺直,燈把也不再具備一個彎弧的設計,以及折枝紋樣只畫葉子,不再穿插花朵的改變

上，明顯地分辨出兩者的不同。但是，回到《視學》插圖究竟為十五世紀上半葉，還是十八世紀上半葉瓷燈之問題，筆者以為，雖然《視學》刊刻的作例，燈把不再有一個彎弧，但整體造型和口足的比例，還是和宣德青花瓷燈較為相似，故仍將插圖看成是十五世紀上半葉的宣德瓷燈。如上所述，凡此和瓷燈相關的事項，均從不同面向，揭露宣德瓷燈傳世的經過。

器形所見交流意象

由於宣德瓷燈造型特殊，加上截至目前為止，在筆者目力所及範圍，尚未發現其他博物館也擁有相同的物件。同時，考慮到整體外觀頗能喚起阿拉丁神燈的有趣聯想，於是以為或可參照 John Alexander Pope 處理美國佛利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收藏的一件永樂朝（1403-1424）青花扁壺的方式，²從作品的器形、紋樣與產製年代，梳理與之相關的東西交流脈絡。進入討論之前，我們首先應該瞭解宣德青花瓷燈究竟如何使用，關於這點，透過《灯火器百種百話》（瀧澤寬，1976）一書揭示的日本江戸時期陶燈的用法（圖7），而能從相仿器式中，反過來理解宣德瓷燈的使用狀況。一旦回到燈具的發展演變，如同孫機研究指出般，九世紀中國湖南省長沙窯生產的陶燈，已將西亞「蓋唇搭柱式」的點燃方法融入當時器作，讓延伸至流口的燈柱可以燃燒照明。³在此之下，宣德瓷燈可以看成是相似脈絡下的產物。

如果進一步將宣德瓷燈的器形拆開來看，那麼扁圓壺式的器身，其實還能和伊朗十世紀左右的陶質和金屬器相互比對，瞭解這種扁圓壺式油燈，流通於伊朗地區的情形。⁴（圖8）其次，就整體造型來看，特別將焦點放在高足、帶把和附承盤的特徵，目前可以透過三個



圖7 日本江戸時代 陶燈 取自瀧澤寬，《灯火器百種百話》，東京：矢來書院，1976，頁123。

例證來思考傳播交流的可能性。第一件黃綠色鉛釉陶燈（圖9），收藏於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定年為十二世紀，產地可能是伊朗內沙布爾（Nishapur）一地。第二件雙層圓盤藍綠色鉛釉陶燈（圖10），收藏於科威特 Tareq Rajab Museum，定年為十至十二世紀，據判斷可能為中亞或伊朗地區產品。第三件鈷藍釉陶燈（圖11），收藏於科威特 Tareq Rajab Museum，定年為十一至十二世紀，產地為伊朗。⁵雖然三件作例和宣德瓷燈都不完全相似，但從形制特徵的比對中，無論如何都反映出可能的關聯。加上傳世也見有十二至十三世紀呼羅珊（Khorasan）地區製造，並且帶高足的青銅油燈。綜整這些現象，似可呼應 Wladyslaw B. Kubiak 以類型學方法，分析埃及福斯塔特遺址（Fustat）出土陶燈殘器得出的論點；⁶即從器形上推論中東地區生產帶把、具高



圖8-1 10世紀 東伊朗 陶燈 科威特國家博物館藏 (Kuwait National Museum) 取自Watson, Oliver.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231.



圖8-2 9世紀 伊朗內沙布爾 青銅燈 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官網：<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49344>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1年12月16日。



圖9 12世紀 鉛釉陶燈 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官網：<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49130>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1年12月16日。



圖10 10~12世紀 伊朗或中亞 鉛釉陶燈 科威特Tareq Rajab Museum藏 取自Fehérvári, Géza. *Ceramics of the Islamic World in the Tareq Rajab Museum*, 133.

足和承盤的陶燈，至遲於十二至十三世紀或更晚時候，方才比較普遍。

位於埃及開羅老城區的福斯塔特遺址，除了出土成千上百的中東地區陶燈，而引起學界關注外，最為重要的，當屬另一批足以見證東西交流事蹟的東亞陶瓷器。雖然這個遺址，因不具備可靠的層位紀年材料，一度讓學者把它看成是一個「垃圾場」。但是佔據其中約百分

之三的中國陶瓷器殘片，無論如何都讓人想到土耳其托普卡匹宮 (Topkapı Sarayı，以下簡稱托普卡匹宮) 的中國陶瓷收藏。因此，在或有所關聯下，自1960年代以來，即受到日本學界相當的重視。⁷ 由日本學界和博物館聯手組成的考古調查團就曾多次前往探訪、採集，累積下來的成果，亦足以作為本文的參考。⁸ 特別是福斯塔特遺址出土的中國陶瓷器殘件中，也包含



圖11 11~12世紀 伊朗 鈷藍釉陶燈 科威特Tareq Rajab Museum藏
取自Fehérvári, Géza. *Ceramics of the Islamic World in the Tareq Rajab Museum*, 141.



圖12-1 明 宣德 青花折枝花卉紋八方燭臺 景德鎮珠山出土 取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編，《明代宣德御窯瓷器：景德鎮御窯遺址出土與故宮博物院藏傳世瓷器對比》，北京：故宮出版社，2015，頁197。



圖12-2 明 宣德 青花花果紋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7812

一部分十五世紀上半葉的青花瓷。此類標本的存在，既可串聯鄭和（1371-1433）船隊第四次、第五次和第七次航程抵達忽魯謨斯（Hormuz）的足跡；又能從忽魯謨斯位於今天伊朗東南部的霍爾木滋（Hormuz）海域一帶，連結三上次男研究福斯塔特遺址傳輸管道，提出從忽魯謨斯到紅海海域愛扎布港的航線，復原中國與伊斯蘭世界相遇的場域，進而為瓷燈器形的來源，勾勒出一個想像的空間。

紋飾的聯想

宣德瓷燈為青花瓷，紋樣呈現的技法，和前述施加單一或摻雜兩色鉛釉的陶燈或金屬鑄造器明顯不同。因此，筆者不免想從筆繪紋飾探索可能的面向。儘管青花瓷燈的尺寸不大，不帶蓋的器身，高度僅有 10.7 公分左右。但全部紋樣卻可以拆解成三種樣式來觀察。第一類是環繞於扁圓壺腹和高足下方的折枝花葉紋。這類圖式由五瓣花朵搭配左右生長的葉子組成。對比宣德官窯器，除了有五瓣花朵單獨出現的邊飾外，中國江西省的景德鎮珠山窯址亦出土一件宣德朝〈青花折枝花卉紋八方燭臺〉。該品於燭槽下方，以及院藏青花瓷碗的圈足外壁或內口沿，都看得到相似的折枝花葉紋。⁹（圖 12）雖然比較之後，這些例證之間，在花朵上，仍然存在多瓣、六瓣和五瓣之別；不過該些紋飾例，應是目前所見最為接近的樣式。

另一方面，因景德鎮窯址也曾出土像八方燭臺般，具備伊斯蘭風格樣式的作例，在該些例證能和中東地區製造的玻璃、陶器和黃銅器對照下（圖 13、14），自 1950 年代以來，像十三世紀敘利亞黃銅器之類的作例，已被看成是景德鎮青花瓷的模倣原型。¹⁰ 以此看來，出現在青花燭臺或瓷燈上的折枝花葉紋，是否也可



圖14 14世紀前半葉 黃銅燭臺 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官網：<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44580>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1年12月1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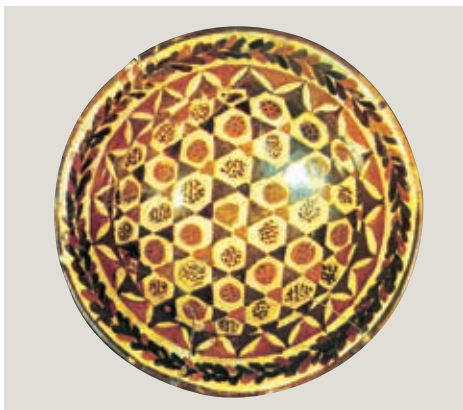


圖15 9~10世紀 伊拉克(?) 虹彩陶碗 希臘貝納基博物館 (Benaki Museum) 藏 取自Philon, Helen. *Early Islamic ceramics ninth to late twelfth centuries*, 79.



圖13 15世紀 波斯細密畫中的黃銅器燭臺 赫拉特·尼扎米《五卷詩》插畫局部 俄羅斯冬宮博物館 (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 藏 取自 Adamova, Adel. *Persian Manuscripts Paintings and Drawings: From the 15th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the Hermitage Collection*. London: Azimuth Editions, c2012, 91.

以看成是具有伊斯蘭風呢？關於此，筆者以為至少必須考量以下幾個面向：其一，如果將視線放在伊斯蘭世界的陶瓷器上，在九至十世紀的伊拉克陶碗（圖15），或十三世紀末至十四世紀的敘利亞陶罐，確實可以發現與之類似的葉紋。¹¹其二，若從宣德瓷燈器身兩側的裝飾細節來聯想，即在紋樣之外，仔細觀察的話，不難發現宣德瓷燈的扁圓壺腹兩側，又有凸起

器表的「乳丁」紋。若將這個特徵，對照九至十世紀的伊朗鉛釉陶燈，還真的可以在那樣的作例上，發現凸出器面的圓錐狀小點。¹²順此脈絡，我們甚至能從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的一件伊朗內沙布爾出土的雙流陶燈，找到有趣的關聯。如圖版所示（圖16），該件作品器身兩側不僅具有凸出的錐狀圓點，器腹亦橫向剔琢出類似往左右兩側生長的葉紋。事實上，在無

法追認景德鎮陶工看到的樣本究竟是什麼的情況下，伊朗陶燈器腹存在的剔琢圖案，或許也可以看成是陶工轉譯的靈感來源。

其三，由於永樂朝和宣德朝一樣，具有鮮明的東西交流背景，所以以折枝花葉紋為視點，



圖16 10世紀 雙流陶燈 伊朗內沙布爾出土 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官網：<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49579>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1年12月16日。



圖17 明 15世紀早期 青花扁壺 土耳其伊斯坦堡托普卡匹宮藏 取自Krahl, Regina.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a complete catalogue*, 423.

確實也可以從景德鎮窯址出土，定年為永樂朝的作例，發現五瓣花折枝花葉紋。更細一點，若僅從葉子左右兩側生長的樣態來看，那麼，院藏永樂朝的青花竹石圖碗、景德鎮窯址出土的湖石雞冠花紋盤，和托普卡匹宮的青花花卉紋扁壺（圖17）都有類似的畫法。¹³ 甚至於十四世紀銷往菲律賓的一件簡易型（或作簡筆型）元青花瓷碗的內底也看得到折枝葉紋。¹⁴（圖18）此現象又提醒我們，元青花瓷器中，無論至正型或簡易型作品，另外還存在折枝菊花和折枝六瓣花紋的邊飾（圖19），因此，從產地著眼，考量到景德鎮陶工或許更為熟悉元青花紋飾下，亦無法排除宣德瓷燈的折枝花葉紋，是從元青花邊飾轉變過來的可能性。

第二類卷草紋，主要分佈於宣德瓷燈承盤外壁，這類圖式亦常見於元青花瓷器，但宣德瓷燈由順時針和逆時針兩種線描交錯組成的旋渦式紋，則和元朝樣式有所不同。同時，因相似的畫法，也見於宣德官窯其他作例（圖20），故可視為是該時的一種官樣邊飾。

第三類斑點紋，這類紋點，依照形狀大小和出現的部位，可細分成三組。第一組形狀較長的斑點，如前所述，尺寸均一地沿著器內口沿排列。第二組圓形斑點，也是規整地沿著壺底排成一圈。第三組小圓點，主要點畫於盤沿裝飾的方格內。同樣以宣德官窯來看，於器口內側，沿邊排佈長形斑點的作法，也見於院藏兩件器形相仿的明宣德青花卷草斜格網紋蓋罐和青花四季花卉紋蓋罐。（圖21）至於在口沿邊裝飾小圓點的作例，也有青花花卉紋花澆一類的作品。（圖22）比較奇特的是，景德鎮珠山窯址出土，定為永樂朝的點彩瓷碗，¹⁵ 器表以筆繪隨意完成的斑點，雖不若宣德成品般地排列工整，但兩者之間有否關聯，猶待未來進一步確認。

另外，值得思考的是，相對於前述折枝花葉和卷草紋，斑點紋倒是常見於伊斯蘭陶器。其中，同樣點畫於器口內沿的作法，普遍出現於十至十五世紀的作例。（圖23）同樣地，在方格填入圓點，除前述提及的扁圓壺式陶燈外，也見於十世紀內沙布爾陶碗或十二至十三世紀的米納伊（Minai）陶碗外壁（圖24），¹⁶由於米納伊陶碗口沿也經常裝飾各式斑點，而內沙布爾又曾是十五世紀帖木兒帝國（1370-1507）統轄的領地之一，和首都哈烈（Herat，阿富汗赫拉特）及前往中國必經的薩馬爾罕（Samarqand）之間，均有道路相通，可視為是進入波斯帝國伊斯法罕（Isfahan）重要幹道上的一個據點。此一地理位置的連繫，又讓人不禁想問，反映在宣德瓷燈上的伊斯蘭元素，會不會也和陸路傳播的途徑有關。

迢迢傳播路

儘管學者研究，曾以伊朗阿德比爾神廟（Ardebil Shrine）和托普卡匹宮兩處的中國陶瓷收藏為例，指出該批藏瓷中，因無帶宣德年款者，故將其中定為十五世紀前半葉的青花瓷，均看成是永樂朝製作。¹⁷但是藉由 John Alexander Pope 指出中國文物通過陸路途徑，如何一路運抵伊朗的可能性，也顯示在明朝大規模海事活動之外，暢通的陸路交通，或是另一個中國與伊斯蘭世界接觸的管道。

永樂三年（1405），當鄭和船隊首度啓航之際，如同 John Alexander Pope 舉例所言，來自西班牙卡斯蒂利亞王國（Castile）的使節克拉維約（Ruy Gonzalez de aclavijo），亦奉國王亨利三世（Henry III）之命，前往帖木兒帝國拜會。使節團一行人途經撒馬爾罕時，碰巧遇到來自中國的駱駝隊商旅，於是順勢打探了中國首都



圖18 元 14世紀 青花瓷碗 菲律賓出土 取自Gotuaco, Larry. *Chinese and Vietnamese blue and white wares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Makati City, Philippines: Bookmark, Inc., c1997, 59.



圖19 元 青花碗殘件 新加坡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藏 取自Gotuaco, Larry. *Chinese and Vietnamese blue and white wares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46.



圖20 明 宣德 青花花卉紋花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04724



圖21-1 明 宣德 青花四季花卉紋蓋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6864



圖21-2 明 宣德 青花卷草斜格網紋蓋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1443



圖23-1 12~13世紀 阿富汗 陶碗 科威特Tareq Rajab Museum藏
取自Fehérvári, Géza. *Ceramics of the Islamic World in the
Tareq Rajab Museum*, 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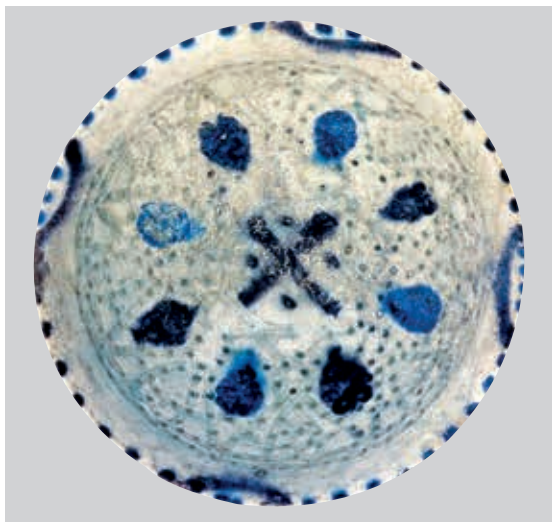


圖23-2 12~13世紀 阿富汗 陶碗 科威特Tareq Rajab Museum藏
取自Fehérvári, Géza. *Ceramics of the Islamic World in the
Tareq Rajab Museum*, 167.



圖22 明 宣德 青花花卉紋花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瓷002907



圖24 12世紀晚期至13世紀早期 伊朗 陶碗 科威特國家博物館藏
取自Watson, Oliver.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368.

的位置所在。¹⁸

另一則相關事例，發生在1419年至1422年之間，也就是鄭和船隊第五次和第六次出使印度洋之際，帖木兒帝國的皇帝沙哈魯（1405-1447在位）亦派遣使節團前往大明帝國謁見永樂皇帝。這項事蹟，如展品所見，具體地記錄在《明史》中，是為「永樂中，遣使七十七人來貢。」（《明史》卷332）同時，依照《沙哈魯遣使中國記》

所言，帖木兒帝國使節團去時走了一條稍微偏南的路線，返程為了安全考量，改走北道。沿路經過薩馬爾罕時，也遇到前往帖木兒帝國拜訪，正在歸途中的明朝使節團，兩個使節團於是結伴同行，再從吐魯番進入中國的領地肅州。當然從明朝方面看，就像展品《西域行程記》所示，縱永樂一朝，陳誠（1365-1457）也四度出使帖木兒帝國，並沿途賞賜禮品。明朝與帖



圖25 15世紀 伊朗 《列王紀》卷首插畫 美國克里夫蘭美術館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藏 取自該館官網：<https://www.clevelandart.org/art/1956.10> (CC0 1.0)，檢索日期：2021年12月16日。

木兒帝國友好往來的經過，也反映在十五世紀上半葉出版的《列王紀》卷首插畫。(圖25)畫中明朝使臣不僅優游於帖木兒皇家花園，同時伊斯蘭王國的器用，如同桌上所擺，竟是充滿中國風或是中國製造的瓷器。¹⁹

根據十八世紀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錢德明 (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 翻譯十五世紀上半葉四夷館文書，也說明吐番國、天方國和撒馬爾罕王國均曾明文請求以玉石、馬匹，交換中國的綢緞和瓷器。²⁰這點讓筆者聯想到，雖然目前並無直接的證據，足以說明宣德青花瓷燈和伊斯蘭器用的關係。但瓷燈的製造，如同

另一批十五世紀上半葉的官窯扁壺(圖26)、筆盒(圖27)、執壺、瓷磚、八方燭臺、折沿洗，和書寫波斯文的器座(圖28)般，均帶有若干伊斯蘭風格樣式的特色。特別是，如果仔細思考仿作和模倣原型的製作年代，其間至少存在百年以上落差的現象，讓筆者不禁懷疑，前述外交文書存在的請求內涵，最後有沒有可能是以特別訂製的方式來處理？也就是明朝宮廷通過精湛的陶藝技術，再現伊斯蘭世界經典器用的可能性。如果這個推測成立的話，自然不難理解何以有伊斯蘭風格瓷器的生產與傳世。

作者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圖27 明 宣德 青花歲寒三友紋筆盒殘片 景德鎮珠山東院出土 取自馮禧美術館，《景德鎮出土名宣德官窯瓷器》，頁121。



圖28-1 15世紀上半葉 青花波斯花紋器座殘片 景德鎮珠山東院出土 取自馮禧美術館，《景德鎮出土名宣德官窯瓷器》，頁121。



圖28-2 15世紀上半葉 青花器座 英國大英博物館 (The British Museum) 藏 取自 Clunas, Craig. *The BP exhibition, Ming: 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2014, 94.



圖26 明 永樂 青花花卉紋扁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16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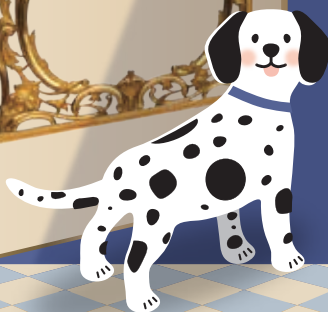
註釋：

1. 原文為「帶錦色，錦二，匣一」，見（民國）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北京：線裝書局，2004），頁 1-142。
2. John Alexander Pope, "An Early Ming Porcelain in Muslim style," in *Aus Der Welt Der Islamischen Kunst: Festschrift für Ernst Kühnel zum 75*, edited by Richard Ettinghausen (Berlin: Verlag Gebr. Mann, 1957), 357-375.
3. 孫機以為新疆巴楚縣脫庫孜薩來出土的唐代銅燈，即是外來器。而長沙窯生產的帶流瓷燈，同樣受到外來影響。見孫機，〈摩羯燈——兼談與其相關的問題〉，《文物》，1986 年 12 期，頁 74-78。
4. Eva Baer, "Groups of Metal Objects," in *Metalwork in Medieval Islamic Ar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3), 18-26; Oliver Watson,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London: Thames & Hudso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al-Sabah Collection, Dar al-Athar al-Islamiyyah, Kuwait National Museum, 2004), 231.
5. Geza Fehervari, "Glazed Lamps and Lanterns," in *Ceramics of the Islamic World in the Tareq Rajab Museum* (London and New York: I.B. Tauris, 2000), 133-143.
6. Wladyslaw B. Kubiak, "Medieval Ceramic Oil Lamps from Fustat," *Ars Orientalis* 8 (1970): 1-18.
7. (日) 三上次男著，李錫經、高喜美譯，《陶瓷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 1-23。
8. 弓場紀知，黃珊譯，〈福斯塔特遺址出土的中國陶瓷——1998-2001 年研究成果介紹〉，《故宮博物院院刊》，183 期（2016.1），頁 120-132。
9. 此類紋樣，《故宮瓷器錄》登錄為「轉枝花卉」，見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編，《故宮瓷器錄》（臺北：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1961），頁 103；耿寶昌以為是「青花水草紋」，見《明清瓷器鑑定》（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頁 48-49。八方燭臺見故宮博物院、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編，《明代宣德御窯瓷器：景德鎮御窯遺址出土與故宮博物院藏傳世瓷器對比》（北京：故宮出版社，2015），頁 196-197。
10. Basil Gray, "The Influence of Near Eastern Metalwork on Chinese Ceramics,"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18 (1941-1942): 47-60. 相關的黃銅器作，見：Esin Atil, *Islamic Metalwork in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 C.: Freer Gallery of Art, 1985), 95-186. 另外，最新文章見 Xuan Chen, "The Invention of the Blue-and-White Pilgrim Flask in 15th Century," *Orientalis* 52 no. 5 (2021): 32-39.
11. 伊拉克作例見 Watson,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188 及 Helen Philon, *Early Islamic Ceramics: Ninth to Late Twelfth Centuries* (London: Islamic Art Publications; Sotheby Parke Bernet, 1980), 79. 敘利亞陶罐見 Barbara Brend, *Islamic Ar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1991), 111. 十三世紀下半葉伊朗孔雀藍釉陶罐見 Stefano Carboni,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courtly art and culture in Western Asia, 1256-1353*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2002), 180.
12. Géza Fehérvári, *Ceramics of the Islamic World in the Tareq Rajab Museum*, 137.
13. 首都博物館編，《景德鎮珠山出土永樂官窯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 154-155，圖版 85；Regina Krahl,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a complete catalogue* (London: Sotheby's Publications, 1986), 423.
14. Larry Gotuaco, *Chinese and Vietnamese blue and white wares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Makati City, Philippines: Bookmark, Inc., c1997), 59.
15. 首都博物館編，《景德鎮珠山出土永樂官窯瓷器》，頁 200-201，圖版 115。
16. Watson,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368; Watson, *Ceramics of Iran: Islamic Pottery from the Sarikhani Collection* (Lond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126. 交流議題的有趣和困難之處，在於存在許多可能性，和不確定性。例如中國四至五世紀生產的青瓷，也有口沿帶斑點的例證。見謝明良，《六朝陶瓷論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頁 312。
17. 劉新園以為宣德五年（1430），船隊第七次下西洋時，因出門倉促，因此隨船帶出的瓷器，均為前朝庫存。而且《大明會典》載宣德八年（1433），皇帝一次下達燒造四十四萬三千五百件的旨令，可能是為了第八和第九次下西洋而準備，只是沒想到，明宣宗後來與世長辭，鄭和也病逝古里，下西洋活動因此停止。見劉新園，〈明宣宗與宣德官窯〉，收入鴻禧美術館，《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臺北：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1998），頁 164-168。
18. John Alexander Pope, *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Freer Gallery of Art, 1956), 19-25.
19. 帖木兒使節團的旅程，見（波斯）火者·蓋耶速丁著，何高濟譯，《沙哈魯遣使中國記》（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頁 334-366；陳誠出使帖木兒帝國，見王繼光，〈陳誠西使及洪永之際明與帖木兒帝國的關係〉，《西域研究》，2004 年 1 期，頁 17-27。《列王紀》卷首插畫，見 Craig Clunas, *The BP exhibition, Ming: 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2014), 276-277.
20. Pope, *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19-25.

華 | 麗 | 魔 | 法 | 屋

故宮的洛可可珍藏

GALLERY 300 陳列室



2021.12.24

ROCCOCO

DECORATIVE ARTS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